

文章编号:1000-2278(2012)04-0437-05

论“官搭民烧”对明清景德镇瓷业发展的影响

吴军明 张茂林 李其江 吴隽 尤琳 吴艳芳 刘晓婧

(景德镇陶瓷学院,江西景德镇333001)

摘要

明清时期景德镇瓷业生产中的“官搭民烧”制度,实际上渊源于宋元以来民窑“有命则贡,无命则止”的办法,最早实行是英宗“正统元年浮梁县民进瓷器五万余,官偿以钞”,制定之初实为御窑厂在无法完成任务时的权宜之举,然而随着朝代的更迭几经变革,其对景德镇瓷业生产中的影响也发生了转折性改变,从制度实行之初的以盘剥、压榨民窑,阻碍民窑发展为主,转而发展成为官民窑相互汲取新技术、新设计元素的有效途径。此时,官民窑关系已从“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转变为“设计”与“生产”、“分工”与“合作”的新关系,这也是清代景德镇瓷业繁荣和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 官搭民烧 瓷业发展 技术交流

中图分类号 K876 文献标识码 A

1 明清时期的“官搭民烧”制度

从明洪武朝开始,景德镇便有了官、民窑同时并存生产瓷器的情形。当然,这种存在并没有产生形成完全公平的竞争发展机制,且不同的时期两者的关系存有明显差异,虽然在明代初期所展现出来的往往是以官压民、以官限民、以官剥民的陶瓷生产现象。但是,到了明后期,随着部限瓷器烧造任务的连年加剧(见表1)以及大量钦限瓷器的需要,御器厂管理混乱,生产运行不畅,烧造任务已很难完成的情况下,为避免愈期完成任务,则采用了“官派民烧”、“官搭民烧”这一权宜之法,即将部分烧造任务分派给民窑烧造的方式。如“旧规本厂凡遇部限瓷器,照常烧造,不预散窑。惟钦限瓷器数多限逼,一时凑办不及,则分派散窑,择其堪用者凑解,固一时之权法也”^[1]。可见,“官搭民烧”制度形成之初,部限瓷器仍由官窑负责生产,仅是将钦限瓷器的烧造任务散之于民窑,且钦限瓷器也仅是部分工序由民窑完成。然而随着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的萌芽,景德镇民窑制瓷业中

新生产关系的出现,以及政治腐败的加剧,景德镇御器厂陷入了严重的危机状态。封建宫廷为维持御器厂在制瓷业中的统治地位,在对民窑依赖程度增加的情况下,利用特权竭力盘剥民窑,将“官搭民烧”制度进一步深化。《江西大志·陶书》中的“官匠因循,管厂之官,乃以散之民窑,历岁相仍。民窑赔赃,习以为常”^[2]。

到了清代,官搭民烧的实行,较明代更为深入,完成了由“官搭民烧”向“尽搭民烧”的转变。据唐英《陶成记事碑》载,唐英主持的御器厂,只负责制坯、

表1 从嘉靖到隆庆年间官窑瓷器生产数量^[3]

Tab.1 The output of the imperial kil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Emperor Jiajing to Emperor Longqing

年代	烧制件数
1529	2570
1531	12300
1544	50000
1555	79750
1571	105770

收稿日期 2012-09-2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编号:10YJC780013)、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编号:10LS10)、江西省社科规划艺术学项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传统资源利用及其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问题研究,编号:YG2010077)资助

通讯联系人:吴军明, E-mail: woshiwxb@126.com

成型和器表装饰,而烧制则由民窑完成。《景德镇陶录》中说:“柴窑多烧细器,槎窑多烧粗器,前代厂制,一窑兼用柴槎四六配烧,今悉搭民窑。”“然今则厂器悉搭烧民窑,照数给值,无役派赔累也。”^[4]说明乾隆时期的官搭民烧,已成为宫廷御用瓷器最普遍的生产方式。此外,清代的御器厂规模较明代时明显缩小,其作用也由原来的生产陶瓷逐渐转变为一个陶瓷设计和开发的研究性基地。可见,从明代到清代,“官搭民烧”制度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且随着“官搭民烧”制度的深入推行以及生产管理体制的放宽,官民窑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促进愈来愈占据着主导地位。

2 “官搭民烧”对景德镇瓷业发展的不利影响

“官搭民烧”制度的实行,官窑除对技术和资源垄断之外,也是对民窑盘剥和压榨的另一种形式。明清时期,尤其是在嘉靖九年以后,官窑制品并非全烧自官窑,其中有一部分系在民窑中定烧。如在明代,朝廷所用的御瓷,凡属工部营缮所分配给御窑烧造的额定瓷称为“部限”,“部限”之外,在民窑中定烧的额外瓷称为“钦限”。史籍中明确记载:“部限瓷器,不予散窑(指民窑),钦限瓷器,官窑每分派散窑。其能成器者,受嘱而择之,不得成器者,责以必办。不能办,则官窑悬高价以市之,民窑之所以困也”^[2]。从这里可以看出,官窑在实行“官搭民烧”制度之时,对民窑可谓不择手段地进行百般刁难,造成民窑凋困。

另外,被指定为官府烧造御用瓷的搭烧窑户,都是设备和技术条件堪称上乘的。如史籍所说:“此镇窑之最精者,统曰窑古。式样不一,始于明,选诸质料,精美细润,一如厂官器,可充官用,故亦称官”^[9]。但即使是这样,民窑也常因为散搭之器,多为“细腻脆薄,最为难成”的御用钦限瓷器^[6],且承差民窑“必陶成皆青品,有苦窳不青器”^[7]则由民窑赔偿,即如果质量达不到要求,就要“定烧赔造”,购买官窑烧制的部限瓷器来顶替,这实际上是对民窑匠户一种严酷的剥削。所以,即使是技术条件上乘的少数包青窑也难以完成任务,或是无利可获。对此民窑则或多方设法应付,消极对抗,常出现“乘限期紧,并以歪斜浅淡瓷器塞责,厂官事逼,姑收凑解”,以至“钦限器皿屡至愆期”,或

因偿银偏低,不够烧造成本,致使“民窑户告称贫苦,难以赔造”^[2],而致衰弱或破产。无论是以歪斜浅淡之器塞责,还是不堪赔付而最终破产,都严重阻碍了景德镇民窑陶瓷产业的发展。况且这些被选中的民窑又是当时景德镇民窑中的佼佼者,也是民窑技术的引领者,可见,官窑通过“官搭民烧”的形式对其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打击,将不利于民窑的自主发展和技术创新,直接影响着整个民营陶瓷行业,乃至整个景德镇陶瓷行业的健康发展。

3 “官搭民烧”对景德镇瓷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明代前期,由于官窑的建立和运行,其强权政策的实行,不仅垄断了优秀工匠和优质原料,还在产品使用、管理,甚至残次品处理等方面也均有十分严格的规定,使得民窑不仅得不到好的制瓷原料、好的生产条件,就连其生产的瓷器品种和纹样也处处受到限制和束缚。这正如《陶雅》卷上所说:“一切官窑等,诸秘色,上方珍品,宝贵甚至,自非近御侍从贵戚巨邸,不能袭受恩泽,赏资频仍。若被穷县酸儒,风尘骚客,虽或生逢并世,躬际圣明,阁观灵威,莫窥禁青”^[8]。官窑制品被视为内府秘藏,社会上难得一见,可见,皇室对御窑产品的垄断,基本上排除了民窑从御窑厂获取先进技术的可能,减少了官府窑场对整个瓷业生产原本应有的积极带动作用。同时也自我断绝了御窑场从民窑场汲取营养的途径,忽视了民间匠人的创造性,御窑瓷器的生产只限于少数人才能的发挥,这极大的阻碍了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但随着“官搭民烧”制度的施行,则大有不同,它为官民窑交流打开了一扇窗户,不仅使得原来“深居宫中无人知”的大量官样瓷品和技艺得以为普通百姓所知和推广应用,大量民间优秀制瓷技术在官窑陶瓷中得以展现,还使得官民窑的技术特长得以充分发挥,产业分工、合作进一步优化。可见,无论是在官民窑互动方面,还是在产业分工和行业发展方面,“官搭民烧”制度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1 “官搭民烧”助推民窑陶瓷技艺升华

“官搭民烧”为民窑陶瓷艺术发展提供了快捷通道,注入了新鲜血液。官窑和民窑一直有一种共生共

依的关系,而民窑是官窑发展的基础,官窑从民窑的基础上建立。而明清御器(窑)厂生产的官窑陶瓷设计,均为“有样可依”的官样产品,在《大明会典》中就曾有所谓“明承元制,凡朝廷烧制瓷器,必由内府定夺样制”的文字记载,不得擅自“僭越”。而这些官样瓷品往往是由宫廷画工、文人等组成的专业团队所设计提供,其优雅而华丽的艺术特色、丰富的装饰题材、细腻的装饰方法,无不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情趣,具有与民窑产品完全不同的艺术情操,成为民窑争相效仿的对象。但是,如前所述,皇家对官样产品有着十分严格的管制,民窑对其不要说是仿制,就连看上一眼也是非常困难的,并且就算冒着杀头之险仿制出来,其销售和推广也几乎不可能。

然而,这种局面随着“官搭民烧”制度的推行,则得以明显改观。一方面,由于大量民间优秀工匠参与到御器(窑)厂陶瓷生产过程中,或官窑、御窑需将画样设计、拉坯成型到烧制的全过程交付民窑,或将烧制的部分委托民窑,使得民窑能在第一时间获取官样产品设计画样、瓷器款式等信息,这为民窑仿制官样产品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官搭民烧”制度推行后,搭民窑烧制的产品中的残次不合格产品,虽要求民窑赔付,但不限制其处理方法,可作为商品自由出售,于是便出现了很多“官窑式”选余产品作为商品流通于民间^[9],这也为官样产品市场化做好了铺垫。到清雍正乾隆时期,民窑陶瓷生产技艺已达到了我国古代制瓷的历史高峰,此时产品在造型和装饰技术上的变化可谓空前繁荣,民窑不仅大量采用和借鉴官窑产品的装饰技法,仿烧具有官样符号的青花瓷、粉彩瓷、颜色釉瓷及仿古瓷等,还在造型设计方面极力模仿官窑产品,仿造了大量新奇造型,如转心瓶、仿生瓷等,将景德镇民窑陶瓷艺术推向了封建社会的顶峰。^[3]可见,“官搭民烧”制度的推行,便于民窑借鉴、吸收官窑产品装饰、设计题材和方法等元素,丰富了民窑产品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内容,为民窑陶瓷发展带来更大的空间。

“官搭民烧”在给民窑压力的同时,也为民窑制瓷技术的提高提供了动力和条件。一方面,“官搭民烧”之器不仅“细腻脆薄,最为难成”,且承差民窑“必陶成皆青品,有苦窳不青器”^[7],否则由民窑赔偿。这给民窑烧造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以求

生存,民窑被迫将这种压力又转化为动力,以“私家竭作保佣”为宗旨,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地获取官窑生产的技术和材料,改进窑炉烧造技术,努力提高产品的合格率。在这种外部条件的逼迫下,促使民窑产品与官窑产品不相上下,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民窑瓷业大发展的历史作用,而这自然又进一步促进了景德镇陶瓷业整体水平的提高。^[6]另一方面,“官搭民烧”制度的实施,虽然是这个时期官窑对民窑进行盘剥的一种新方式,但也打破了以往官民窑互相对立、排斥的局面,官窑不再强行占有优质原料和优秀工匠,次色瓷器也不再打碎掩埋,为民窑制瓷技术的提高提供了优质的资源条件。此外,官窑利用当时最优秀的原料、最熟练的工匠以及最完善的制瓷场地创造出的大量优秀制瓷技艺,也在“官搭民烧”的过程中流入民间,在民窑产品中得以移植和发展,促进了民窑产品质量的提高,使得民窑制瓷名家辈出,如万历年间就有制瓷名家陈仲美、吴明官及小南窑等。^[10]可见,“官搭民烧”制度的施行,增强了官民窑制瓷技术的相互交流,大大推进了景德镇整体制瓷水平的飞速发展。

3.2 “官搭民烧”为官窑技术创新和发展赢得空间

官搭民烧不能等同于官窑,官搭民烧的制品不能等同于官窑制品。但官搭民烧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又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官窑的生产^[11]。

从明代到清代,随着“官搭民烧”向“尽搭民烧”的转变,官窑和御窑这种逐渐脱离生产烧制而走向委托承担的方式预示着“官窑”和“御窑”正成为一种创意和设计的部门,而相应的生产烧制则由民窑而完成,官御窑呈现出了“去生产烧制化”的趋势。清代御窑厂的定员虽仅有二、三十人,但多是才优技精之人,且因为职责相对于以前来说要清闲的多,所以仍有足够的精力去从事陶瓷生产的研究工作。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清代御器厂已具备了现代研究院、所的性质。^[12]这也是清代盛世时期,宋代的汝窑、官窑、钧窑、哥窑、定窑、龙泉窑等名窑优质瓷器,明代永乐、宣德、成化、嘉靖等官窑所产精品,都能较成功地在御器厂仿烧,创新的瓷器品种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御器(窑)厂在研发阶段对于不理想的产品,往往果断地止步于实验阶段,这点从考古发掘出土的数量众多的落选御用瓷器中,有不少品种属首次发现,有的还是孤品可以看出。^[13]御窑在试烧新品种方面,对于中国

瓷器发展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而这点恰恰是以生产商品化产品、以盈利为目的的民窑难以做到的。由此可见,“官搭民烧”制度的施行,不仅为官窑陶瓷技术创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赢得了广阔的空间,也推动了景德镇瓷业整体水平的提高。

民窑优秀制瓷技艺在“官搭民烧”过程中也反过来向官窑产品渗透,并促进了官窑制瓷技艺的提高。“官搭民烧”制度的建立,打破了以往官民窑互相对立、排斥的局面,从而相得益彰,共同促进,一时间官民竞市、争奇斗艳,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精品杰作。在相互竞争中,官窑制品也明显地吸收了民窑产品的优秀元素。在纹饰题材方面,民窑纹饰的题材比官窑瓷器纹饰的题材广泛得多、丰富得多,许多纹饰直接取自大自然和百姓生活的场景。而这些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情趣的装饰题材,也逐渐在官窑产品中得以体现,如“婴戏图”等。在制瓷技艺方面,一方面民窑在商品化加速发展中,为了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不断求新求异求精,创造出了许多优秀陶瓷新品,如明代吴十九制作的卵幕杯、流霞盏等,而这些新品一经出现不仅得到了社会和广大消费者的普遍认同,同时也得到了皇家贵族的赏识,因此这些优秀制瓷技法也随之被官窑制瓷所借鉴应用。另一方面,民窑制瓷受到原料等资源的限制,只能在制瓷技法上求突破,如康熙时期画工们就根据中国水墨画技法及西洋画中的明暗法,开创了新的分水工艺——“分水皴”法,也称“混水”法^[3],即用浓淡不同的青花料水彩绘,便会呈现浓淡不同的色调,因此该时期青花瓷也享有“青花五彩”、“料分五色”之誉,巧妙地规避了用国产“浙料”发色鲜艳而浓翠的单一性特点。此外,民窑青花将传统的中国水墨画的技艺创造性地运用到瓷绘装饰中去时,还出现了“一笔点划”、“单线平涂”、“线描”等多种瓷绘技法,而这些优秀的制瓷技法在随后的官窑产品上均有体现。

4 结 语

“官搭民烧”的实行最初并非是一种积极主动之举,而是因御器厂监官“委杂而不专”、“官职懈怠”造成厂内管理混乱,生产运行不畅,故无法完成宫廷委派的制瓷任务,而将其中的一部分负担加派给民窑的无奈被动之举。^[11]但,“官搭民烧”的实行却在官窑盘剥民窑的同时,为官民窑交流打开了一扇窗。对于官窑和民窑,无论是制瓷技术还是装饰技法方面,均表现有明显的交融和促进。可见,“官搭民烧”的实行,是官民窑互为补充,共同进步的桥梁,促进了官民窑的深层次交流和景德镇瓷业整体水平的大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梁森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 2 王宗沐.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窑制》
- 3 方李莉.景德镇民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 4 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十),郑廷桂补《陶录余论》
- 5 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二)
- 6 李绍强.论明清时期官窑与民窑的关系.齐鲁学刊,1999,4,82~88
- 7 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四).《陶务方略》
- 8 张宁,赵光林.略论景德镇官窑青花瓷器.景德镇陶瓷,1993, Z1,49~51
- 9 欧阳世彬.论青花艺术遗产“官窑与民窑”.广东陶瓷,1987
- 10 耿宝昌.蒋祈与唐英.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1):49~51
- 11 赵宏.“官搭民烧”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1):81~85
- 12 刘森.督陶官与清代前期御窑的成就.中国历史文物,2007,2,52~59
- 13 刘新园,权奎山,李一平.江西景德镇市明清御窑遗址(2004年的发掘).考古,2005,7,35~41

The Influence of "Manufacturing Imperial Porcelain in Commercial Pla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Jingdezhen Ceramic Industr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U Junming ZHANG Maolin LIQijiang WU Juan YOU Lin WU Yanfang LIU Xiaojing
(Jingdezhen Ceramic Institute, Jingdezhen Jiangxi 333001, China)

Abstract

"Manufacturing imperial porcelain in commercial plants" is a pattern of Jingdezhen ceramic production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operating and terminating a commercial plant by the imperial decree for the need of the court"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schedule was first implemented as an expedient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Yingzong in Song Dynasty when the official ware plant was unable to produce enough to fulfill the imperial order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had to collect more than fifty thousand ceramic pieces from commercial plants in Fuliang county at the expense of official funds". With the alternating of dynasties, there were major fundamental changes in Jingdezhen ceramic industry. Manufacturing imperial porcelain in commercial plants was no longer a way to plunder commercial manufacturers or an obstacle in their progress; instead, it provided a venue where the imperial and the commercial ware plants were able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new techniques and new designs. In this sense, the ol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loiter and the exploited changed into a new one between the designer and the producer, or a more cooperative one between collaborators engaged in different divisions of labor.

Key words "manufacturing imperial porcelain in commercial plants"; development of ceramic industry; technological exchange